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一道德同風俗 王安石新學的歷史定位及其相關問題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80-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夏長樸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18 日

一道德同風俗

——王安石新學的歷史定位及其相關問題

台大中文系 夏長樸

中文摘要

王安石新學是道學興起之前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從北宋神宗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在位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三經新義》，不僅學校誦習，科舉用以取士，也始終是朝廷認可的官學，在宋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宋室南渡後，由於時論將北宋敗亡的責任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加以道學興起，人才輩出，聲勢日盛，終於使得道學完全取代新學，成為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這也迫使曾經如日中天、盛行一時的王安石新學因而走入歷史，不再成為學界注意的對象。

有鑑於王安石新學曾為宋代的顯學，不僅有過輝煌的過去，也曾引領一時風騷，對當時學術極有影響。學術研究本以求真，存亡繼絕、發凡起覆以還歷史的原貌，更是從事研究工作者戮力以赴的理想。在討論過道學的成立與發展之後，本計畫預定以王安石新學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學術思潮的歷史地位及其與道學發展的關係，希望藉此對宋代慶曆至慶元時期的學術發展有更清楚的理解與掌握。

關鍵詞：新學 道學 王安石 三經新義

英文摘要

Uniting the Way and Virtue, Unifying Customs: Historical establishment of the *hsin-hsueh* of Wang An-shi and related issues

English abstract

The *hsin-hsueh* (新學) school of thought put forward by Wang An-shi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urrent in Song dynasty thinking prior to the rise of *tao-hsueh* (道學).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Song emperor Shentsung to the access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emperor Kaotsung,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sin-hsueh* was the *San Ching Hsin Yi* (三經新義).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text was not only used for academic study and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t was also regarded as the official study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us, it has an unassailable posit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ng dynasty thought. However, after the Song capital moved south, this school fell out of favor sin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oss of the North was

attributed to the radical policy changes of Wang An-Shih. In addition, the rise of *tao-hsueh* (道學) supported by numerous talented and productive individuals, completely replaced *hsin-hsueh* to become the stream of though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ng. These factors combined to relegate *hsin-hsueh* to merely an aspect of history, rather than a primary object of scholarly attention.

The *hsin-hsueh* of Wang An-shi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notable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having a brilliant past that set the tone of its time, but also having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cholarship of that period. Scholarly study originally searches for truth, points of critical juncture and induces a return to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y, it is the ideal of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the collective work of pursuing study. In discuss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later development of *tao-hsueh*, this plan proposes to take the *hsin-hsueh* of Wang An-shih as its primary object of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is scholarly trend, together with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o-hsueh*. This should provid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ly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from the *Ch' ing-li* (慶曆) to the *Ch' ing-yuan* (慶元) period.

Keywords: *hsin-hsueh* (新學). *tao-hsueh* (道學) Wang An-shi (王安石) *San Ching Hsin Yi* (三經新義) official study (官學)

目錄

- 一、前言
- 二、何謂「王安石新學」
- 三、新學與當時政治的關係
- 四、新學與道學的互動關係
- 五、結語：新學對宋代學術的影響

報告內容

(一)、前言

王安石新學是道學興起之前宋代主要的學術思潮，從北宋神宗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在位時期，新學的代表著作《三經新義》，不僅學校誦習，科舉用以取士，也始終是朝廷認可的官學，在宋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宋室南渡

後，由於時論將北宋敗亡的責任歸咎於王安石變法，加以道學興起，人才輩出，聲勢日盛，終於完全取代新學，成為宋代主要的代表學術。這也使得曾經如日中天、盛行一時的王安石新學因而走入歷史，不再是學界注意的對象。

有鑑王安石新學曾為宋代的顯學，不僅有過輝煌的過去，也曾引領一時風騷，對當時學術極有影響。學術研究本以求真，存亡繼絕、發凡起覆以還歷史的原貌，更是從事研究工作者戮力以赴的理想。在討論過道學的成立與發展之後，本計畫預定以王安石新學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學術思潮的歷史地位及其與道學發展的關係，希望藉此對宋代慶曆至慶元時期的學術發展有更清楚的理解與掌握。

（二）研究目的

王安石新學曾是北宋神宗時期以後的主要學術思潮，其盛行時期與道學（理學）重疊而稍早，新學在當時的影響力也決不在後起的道學之下。南宋中期以後，道學發展為宋代的主要學術思潮，影響所及，元明兩代都是道學當令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原本曾有輝煌過去的王安石新學轉趨沈寂，以致無人聞問，成為歷史的陳跡。

黃宗義、全祖望等人編纂的《宋元學案》一書，是論述宋元兩朝學術史的重要著作。由於這部書在編寫態度上過於偏向道學，沒有照顧到宋學的全面，因此曾為北宋顯學的王安石新學、三蘇蜀學，都只略備一格的成了「學略」，學術地位遠在其他「學案」之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極大的缺陷。由於《宋元學案》是晚清、民國學者研究宋代學術史時甚為倚重的參考著作，他們的觀點自然深受此書的影響，因此，有關宋代學術思想的論述，很少注意到王安石新學，即使有的話，多半只是附帶提及，並不將其視為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主題。

有關王安石思想研究的著作，近年來已有相當幅度的成長。但是，必須指出是，除了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12）、姚瀛艇等人先後合編的《北宋哲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宋代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程元敏的《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國立編譯館，民國 75-76 年）以及蕭永明的《北宋新學與理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涉及王安石新學的研究外，其餘學者的研究基本上只集中在王安石個人思想的研究，而忽略了新學方面的探討，就宋代學術史的研究而言，這的確是不小的缺憾。

筆者多年來即關注這個問題，除曾以王安石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王安石的經世思想》（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民國 69 年）之外，有關王安石研究的專書有《李觀與王安石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 78 年），以及期刊論文多篇，主題全與王安石研究相關。經過長期的醞釀與思考，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可以進行此一問題的研究工作。故而決定在本人近年來「宋慶曆至慶元之間儒學發展」研究計畫下，集中探討王安石新學的成立、發展及其影響。

本計畫的提出與研究，主要目的即在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王安石新學在北宋末南宋初學術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一前提下，筆者打算分別就「

何謂王安石新學」、「新學與當時政治的關係」、「新學與道學的互動關係」以及「新學對宋代學術的影響」等主題進行探討，藉以建構王安石新學在宋代學術史上的正確地位，也希望此一研究對了解宋代學術發展的確實狀況能有所裨益。這是本計畫的主要目的。

（三）文獻探討

民國以來，王安石研究蔚為風氣，但是研究重點多半集中在王安石的文學及熙寧變法問題上，研究王安石學術的學者不多，以王安石新學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則更少。梁啟超的《王荊公》（中華書局，1966）討論了王安石的知命之學，他是近代學者中最早注意到王安石學術價值的人。陳鐘凡的《兩宋思想述評》（華世出版社，1977），則在〈江西學派〉一章中討論了王安石的政治學說。抗戰期間，賀麟先後發表了〈王安石的心學〉（《思想與時代》41期，1941/1）、〈王安石的性論〉（《思想與時代》41期，1941/3），這是兩篇專論王安石心性之學的哲學論文，立論精闢，頗有參考價值。錢穆的〈初期宋學〉（《中央週刊》8：18，1946/5）雖然並非專論王安石，但是探討了王安石思想的特色與貢獻，並首先確認王安石在宋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是相當值得注意的論述。當代學者中，研究王安石經學最有成效的是程元敏，程氏不僅獨力完成九十五萬言的《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國立編譯館，1986-1987年），為研究王安石經學提供翔實可信的資料，同時又有〈三經新義修撰通考〉、〈三經新義與字說科場顯微錄〉、〈王安石雋父子享祀廟庭考〉、〈三經新義修撰人考〉、〈三經新義板本與流傳〉（以上論文均附於《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各書之後）等相關研究論文，對王安石經學的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此外，王明蓀的《王安石》（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3年），是近年來專以王安石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專著，用力甚勤，頗具參考價值。鮑國順的〈王安石性命思想探究〉（中山大學學報，民國87年）則在賀麟、夏長樸等人之外，另提出對王氏人性論的解釋，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說法。

在大陸學界方面，侯外廬是最值一提的學者，侯氏的《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12）是思想史的名著，學界的影響力不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之下。《中國思想通史》在宋代思想部份特闢〈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和唯物主義哲學〉一章，專論王安石的思想，分別討論了王安石新學各個部份，以及新學的學術地位。這是所有中國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中，最重視王安石思想的一部論著，在大陸學界中也有相當的影響，此後石訓、姚瀛艇等人先後合編的《北宋哲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宋代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也都將王安石的哲學思想列為專章，就是具體的明證。侯著之外，馬振鐸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一書，不僅探討了王安石的哲學思想，同時也注意到王安石新學及其歷史地位，可惜過於簡略，缺乏展開，探討深度有所不足。近年來大陸學者探討王安石學術思想的風氣逐漸開展，新的論著也經常在期刊上出現，李之鑒的《王安石哲學思想初論》（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與李俊祥的《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則是較新的兩本專書，可惜的是前者的研究方式仍然擺脫不了唯物史觀的框架；後者資料蒐集頗為用心，但傳統學術的素養稍嫌不足，都未能有超越前人的

表現。二十世紀末期，大陸地區接連出現幾部以王安石新學為研究對象的專書，期刊論文也有多篇，沈霾近千年的學術思潮開始有學者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工作，的確是可喜的消息。由於蒐羅未能全面，目前可知的有耿紀平的博士論文《北宋新學學派研究》（收藏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編號：Y393424）以及蕭永明的《北宋新學與理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者尚未見到，仍在繼續設法搜訪中；後者主要是新學與理學的比較研究，作者分從學術產生的背景與學術環境、為學方法、社會政治思想的異同本體論構建的特點以及兩者的不同歷史命運及其原因做了比較，對關心理學與王安石新學的學者而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海外學者方面，日本的東一夫是王安石研究的專家，有關王安石研究的專書極多，其中又以《王安石法之研究》（風間書房，1970年）一書最為著名，但重點集中在新法及政治思想方面，並未涉及新學部份。其他如：內山俊彥、庄司莊一、安藤智信、寺地尊、近藤正則、麓保孝等人，都有關於研究王安石思想的單篇論著，值得參考。歐美學界中，劉子健（James T.C.Liu）在王安石研究上著力最深，他的“*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是研究王安石變法的重量級著作，在歐美漢學界影響力極大。近年來美國學者 Peter K. Bol 在其名著“*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此書已有中譯本，包弼德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列有專章，從思想史、政治史的角度，探討王安石所提出的政治理想模式，在唐宋思想變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是相當具有創意的處理方式，頗有啟發性。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在研究方法上採取分析文本、詮釋資料的研究方式，並配合筆者開設的「宋代學術思想專題」課程，同時進行。

在研究步驟上，首先儘量蒐集相關資料，資料務求儘可能齊備。

其次閱讀資料，選取與本計畫相關的資料。分析解讀資料，在此過程中並參酌近人的研究論文，比較是否有所差異；若有不同，則同時嘗試解釋差異產生的原因所在。積累既多，具體觀點形成後，進行論文主體結構的架設；結構完成後，即開始進行論文的撰寫工作。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目前學界習知的宋代學術史，其實不是宋代學術發展的真正面目，它是經過後代學者重新建構出來的學術發展，就求真求實的學術研究而言，這種現象的存在竟有數百年之久，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就宋代學術的發展而言，道學的出現並非直接上承慶曆思潮的，起碼從神宗到南宋高宗之際，真正主導學術，影響思想界的不是道學，而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

何謂「王安石新學」？這是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簡單來說，所謂「王安

石新學」，指的就是北宋仁宗末期至南宋高宗時期盛行的以王安石學術為主體，包括王安石本人、他的學生以及《三經新義》、《字說》等著作為中心，所形成的一個學術流派。「王安石新學」最早創始於宋仁宗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年）年間，這一段期間，王安石的《易解》、《淮南雜說》、《洪範傳》以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等個人主要著作都已完成。這些著作中，有關王安石的哲學觀、政治觀、經濟觀以及教育觀都已形成，他個人的學術體系也已完成，這可說是「新學」的創立期。在這些著作中，《易解》雖是他早期的著作，其後卻頗受學界的肯定，極力反對他的道學大家程頤即曾說：「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9，〈與金堂謝君書〉），王安石是程頤學術上的主要對手，他對王安石的這部書卻推崇不已，儘管安石本人並不滿意這部早期作品，但當時學人對這部書的成就是極為肯定的。王安石的《淮南雜說》是他的成名之作，全祖望的《宋元學案·序錄》即曾說：「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為《孟子》。」他的弟子陸佃更說：「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荊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於是願掃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獎，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陶山集》，卷16，〈沈君墓誌〉）雖不無溢美之嫌，亦可見這兩部書在當時是頗被看重的。至於〈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是王安石經世致用思想的主要文字，蔡上翔曾喻為「秦漢而下，未有及此者。」（《王荊公年譜考略》，卷6，〈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足見這篇文章份量之重！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喪返金陵，迄至熙寧元年（1068年）奉詔入朝，這五年之間是安石聚徒講學時期，也是他開始培養後進，擴展學術影響力的重要階段，陸佃、蔡卞、龔原等熙寧變法的主要幹部，多半都是此時匯聚江寧受學的弟子。

從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受任翰林學士，次年任參知政事，一直到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逝世，這是「王安石新學」影響力最大的一段時期。這段期間，熙寧新法在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展開，也是王安石以經術經世務的具體實踐時期，除了新法如火如荼的推行之外，《三經新義》也在「一道德以同風俗」的思惟下編纂成書，頒行全國。在學校通行、科舉必考《三經新義》的形勢下，「王安石新學」正式成為朝廷認定的「官學」，影響力擴大到全國，也開始面臨反對者的批評、質疑與抵制，其中最大的反對者即是與「新學」同時而稍後的「道學」。在這段期間的後半期，王安石的晚年力作《字說》也在他息影林下之後完成並呈給朝廷，正式成為「新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字說》雖未經朝廷列為科舉考試內容，但在社會上流通甚廣，也是反對新學者主要的攻擊目標。

哲宗元祐時期，在舊黨當政的情況下，「王安石新學」雖受到歧視，但並未全面禁絕，依然是學校學習、科考應試科目之一。從這段時期開始，「程學」逐漸開始壯大，並且逐漸形成與「新學」對抗的局面，雖有「元祐黨禁」的挫折，但在人才輩出，凝聚力強的情況下，始終能維持學術的發展與深化。靖康之變，宋室南渡，高宗即位之後，雖然救亡圖存是朝廷主要用力所在，但在南宋政局逐漸穩定之後，學術走向又成了政、學界共同關心的課題。雖然高宗

標榜「朕最愛元祐」，但在權相秦檜大權獨攬的情況下，刻意拉拔「王學」，以與政敵趙鼎支持的「元祐之學」（道學）相抗衡，「王學」就在這種微妙的政局下繼續行於場屋之間，但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就此而言，南宋以後，是道學逐步上揚而新學相對逐漸式微的時代；雖說如此，新學的流行，也維持了七十年之久，此後纔是道學當令的時代。這是宋代學術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不因後人觀念的移轉而有所改變。

何以知道這一段時期學術的主流是王安石新學而非二程主導的道學？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首先，王安石主導修撰的《三經新義》於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頒行於天下，從此《三經新義》成為學校士子學習、科舉考試必考的書籍，一直到南宋寧宗慶元元年（119年），雖已式微，猶在學校傳習，可見其影響之大。至少到南宋高宗在位時期，《三經新義》還是學校、科場的主要學習科目。此時，二程的著作仍然沒有成為學習的主流，兩者的影響力大小還是有相當的差距，孰為主流是顯而易見的。其次，二程創建的道學約與王安石新學同時而稍遲，翻檢二程及其弟子的著作，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學家的心目中，他們在乎的對象有二：一是佛教，一是王氏新學。《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有一段記載特別值得注意：「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關，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佛教是長久以來的異端，反對他們是傳統儒家認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但道學家反對王氏新學，就非比尋常，具有特殊的意義。如果道學此時已是主流，是朝廷承認的官學，道學著作為士子學習、科舉考試必考的科目，則道學家不必在乎王氏新學，更不必處處攻擊王學。所以會出現這麼普遍的批判、攻擊王安石新學，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力爭上游的道學學者希望取得政界的官學地位、學界的主流地位，因而竭力攻擊對方，希望藉此取而代之，成為主導學術的主力。余英時先生認為「二程確將『新學』看作天字第一號的思想敵人，尚遠在佛教之上。」並且強調：「二程道學是在與『新學』長期奮鬥中逐漸定型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82-84）是一個相當公允的論斷。如此看來，王安石新學在當時是學術界的主流殆無疑問，否則二程等人就不必這麼大張旗鼓的去攻擊它、打倒它了。

王安石新學之所以能風行一時，成為顯學，自有其道理，如果仔細思索，原因有二：

其一，是王安石新學本身具有某些特點，這些特點包括：1. 擺落漢唐註疏，直接詮釋經典。南宋學者王應麟對此有最簡要的評論，他說「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困學紀聞》卷8，〈經說〉）劉敞的《七經小傳》是開宋人說經新風氣的第一部說經之作，王安石的《三經新義》雖非最早如此作的經學著作，由於列在官學的關係，影響卻是最大。自此以下，宋人說經的風氣完全脫離了漢唐舊傳統，走出全新的一種說經風氣。在這過程中，毋庸置疑的是，《三經新義》扮演了最關鍵性的角色。2. 注重義理闡釋，開啟注重心性之學的新風氣。漢唐學者說經，注意章句訓詁、名物制度的訓解考釋，義理

的發揮不是重點。王安石說經則一改前人的舊傳統，將義理的闡釋當作重點所在，不僅如此，他尤其注意經典中心性之學的闡揚，他曾說：「先王之道，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臨川先生文集》，卷82，〈虔州學記〉）安石的解經就在挖掘出經書中所存在的性命之理，並將其發揚光大。這種作法恰與慶曆以來，儒者為對抗佛家而力圖回歸儒家經典，從中開發出儒家自有的心性之學的趨勢相配合，成為當時學界中少有的關注心性之學的學者。因此而帶動了探討心性之學的一股風氣，也為稍晚的道學家開啟了新的途徑，無怪乎他的學生兼女婿蔡卞要強調：「自先王澤竭，國異家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云。」（趙希弁《郡齋讀書志·後志》卷2，《王氏雜說》十卷引蔡京（按：當作「卞」））〈王安石傳〉）金趙秉文亦說：「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1，〈原教〉）又說：「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例行之實，其蔽至於以世教為俗學。」（同上書，卷1，〈性道教說〉）兩者同以王安石為開啟宋代儒家道德性命之說的原創者，雖與學術事實有所出入，但王安石新學的盛行帶動了學術風氣的轉變，卻是不爭的事實。3. 王學本於儒家，但廣納各家之長，不受門戶所限的作風，普受社會肯定。在〈答曾子固書〉中，王安石很坦白的說明了他自己的治學風格，他說：「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之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臨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書〉），因此，相較於同時的其他二程洛學、三蘇蜀學，甚至於所謂異端外教的佛、老之學，安石新學展現了更大的包容性，擷取各家之長，而融為一體，唯道是求。與同時的儒家學者多半謹守儒家立場，諱言接受佛、老影響的作風相比，新學是作風開放而更具普遍性的學派，這正是王安石一再強調的：「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雖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雖周孔所不敢從。」（釋惠洪：《冷齋夜話》，卷6，〈曾子固諷舒王嗜佛〉條），不專主一家，不迷信權威。無怪乎這種學風在朝廷的倡導下會風靡一時，成為當時社會大眾樂於接受的顯學。

其二，是宋神宗對王安石的極端信任與全力支持。南宋學者呂中即曾說：三代以來，書生得君自安石始。其始見神宗也，真以文帝、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徵）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智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所謂擇術講學之方，雖孟子告君，殆不過是。人主安得不信其知道哉！（《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卷15）就帝制時代而言，君臣的關係是五倫之一，不可逾越，也不能改變的。如果沒有皇帝的支持與信任，再能幹再積極的朝臣也不可能做出一番事業，這種情形充斥了整個中國的歷史，屢見不鮮。宋自仁宗中期以後，因循苟且，開國以來的重大積弊已經接近拖垮整個國家的地步。有識之士無不力主改革，這是當時社會的輿情，也是有心之士所一再疾呼的。范仲淹在眾望所歸的形勢下出任參知政事，有韓琦、歐陽修等賢人積極輔佐，天下望治，一年不到即無功而退，僅留下「慶曆變革」的美好理想

，原因何在？宋仁宗雖欣賞而不「力挺」是最大原因。由此可見，大臣將欲有為，「君臣相得」是不可或缺的必然要件。相較於范仲淹的遭遇，王安石的際遇與機會就好得太多了。神宗與王安石的相得，在歷史上可說罕見，熙寧初的宰相曾公亮即曾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15，「熙寧三年九月庚子」條）言辭雖然誇張，卻相當接近事實。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當時安石即曾說：「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4），從這裡看來，神宗對王安石可謂佩服備至，自然對他言聽計從了。在這種情形下，安石的學術自然得到神宗的大力支持，《三經新義》的編纂固然是安石基於「一道德同風俗」的立場而有意為之，神宗的大力鼓勵也是主要原因，這由《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可以清楚規知：「熙寧五年（1072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黎僉、張諤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安石曰：『《詩》已令陸佃、沈季長作義。』上曰：『恐不能發明。』安石曰：『臣每與商量。』——季長，錢塘人，安石妹婿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9），五天之後，也就是正月壬寅，「上曰：『朕欲卿錄文字，且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誥文字，容臣綴輯禁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9）同年五月，神宗又談起「一道德」之事，「熙寧五年五月甲午，上謂安石等曰：『蔡確論太學試極草草。』馮京曰：『聞舉人多盜王安石父子文字，試官惡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當如此說，則安可臆說？《詩》、《書》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遠能邇」，《詩》、《書》皆有是言，別作言語不得。臣觀佛書，乃與經合；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合猶符節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語即異，道理何緣異？』安石曰：『臣愚以為，苟合於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異。』上曰：『誠如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3）君臣之間經過這三次的討論，同認為要「一道德」，勢必由官方修經義不可。次年年初，神宗又主動提起由朝廷修經義一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熙寧六年（1073年）三月庚戌，此前，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況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同上書，卷243）經過這許多次的反覆討論，對修經義一事，君臣之間以及朝廷內外，大致取得共識。於是，熙寧六年三月庚戌，神宗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修撰。其後又命王安石提舉此事，開始進行修經義的工作。（同上書，卷243）經過兩年三個月的時間，三經義已修成，並由朝廷正式頒行，史載：「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己酉，中書言：『《詩》、《書》、《周禮義》，欲以副本送國子監鏤板頒行。』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65）從上述的相關資料可以看出，《三經新義》的修撰，前後經過宋神宗與王安石之間反覆再三的討論，在「一道德」的前提下，終於達成進行修撰的具體共識。《三經新

義》的修撰、頒行所以能成功，神宗的提議與堅定支持，是最主要的因素。王安石新學的影響力也因《三經新義》的頒行而大為擴展，成為當時的顯學，這是當時其他學術所難以企及的。

王安石新學在官方的支持下成為影響力最大的學派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其他不同學派的批評與質疑。在這許多不同的學派中，立場最堅定，思想內容最有系統，並且對新學形成最大威脅的就是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當時稱為「伊川之學」；其後因新舊黨爭的牽連，被打為「元祐之學」，也就是南宋時代的「道學」。道學的興起、發展、茁壯，以迄在南宋取得最後的勝利，成為南宋中期以後的學術主流，在在都與新學相關，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道學發展史，就是與新學爭奪學術領導權的歷史，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道學從二程時代開始，就以王安石學術，也就是王安石新學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與王學的對抗，其重要性猶在對抗學術異端——佛學之上，有關程頤批評王學，並以王學為思想界主要對手的言論上文已經引述過，此處不再重複，只列舉兩位道學反王的健將——楊時與王居正的言論為代表，藉以說明道學家如何批評、排斥，甚至污蔑王安石，以攻擊王學，進而希望取而代之。

楊時是二程的高足，又享高壽，在攻擊王安石，破壞王安石形象上，扮演了類似急先鋒的重要角色。程頤在世時，即極為欣賞這個學生，曾說：「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遍，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2上，〈二先生語二上〉）楊時本人，亦頗以此自喜，遂撰有《三經義辨》以攻擊王學。他曾在一封書信中透露自己頗以深通王學之蔽為傲，他說：「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龜山集》，卷17，〈與吳國華別紙〉）就在這種自我期許下，靖康元年（1126）當欽宗繼位之後，五月戊辰，楊時即上書欽宗，痛陳王安石學術不正，誤己禍國，他說：「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龜山集》卷1，〈上欽宗皇帝〉其七）疏奏，欽宗即接受楊時的建議，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當時諸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科第，突然聽聞楊時之言，目為邪說，議論紛紛，群起而攻之，造成不小的群眾運動。此事經御史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批評楊時言語不當，在罷黜時祭酒，詔改為給事中之後風波，始告平息。這是道學學者在北宋末初次猛烈攻擊王安石，也達到了剝奪安石配享的目的。

王居正是另一個攻擊王安石，削弱王學影響力的學者。他年輕時，曾因不為王氏學，放棄舉業，是一個謹守原則相當有骨氣的學者。他曾撰有《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等書，專批

王學之謬。高宗紹興五年(1135)三月庚子，王居正以兵部侍郎身分，獻《辨學》四十二篇。…其書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辯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書上，詔送秘書省。(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87)這部書是攻擊王學最徹底，也是最具殺傷力著作。呂祖謙：〈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居正)行狀〉即說：「時名公卿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辟。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於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助也。」(《東萊集》，卷9)經過楊時、王居正的反覆攻擊，王安石新學的學術地位頗受傷害，加以道學人才輩出，整個朝廷的政治態度又已傾向將北宋覆亡的責任推給王安石承擔，在此情形下，《三經新義》雖仍是科舉考試的科目，但學術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道學與王學的升降消長，孰強孰弱已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實。

王安石新學對宋代學術有何影響？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以下我們分項來做分析：

第一、先就王安石本身的學術而言，他注意道德性命之學的探討，而且強調事功必須建築在「窮理盡性」的基礎上，這種貫穿內聖外王的主張，雖然其來有自，但卻為以下的學術開啟了新的面目。他雖非道德性命之學的首倡者，透過「新學」的發揚，使得心性道德成為後來學者莫不關心的問題。道學家抨擊安石不了解道，其實他們論述道也受到安石的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第二、王安石新學的核心著作《三經新義》透過學校的學習，科舉的考試，成為士子們人人必讀的作品。《三經新義》在著作形式上擺脫了漢唐註疏的固定格式，直接註解古人的典籍，不受漢唐註疏的約束，這是經學著作形式的一大改變；《三經新義》強調解經的目的在於義理的掌握，就解經而言，這是經學研究的一大突破，徹底轉變了經學研究的方向，這是宋代經學迥異於此前傳統經學的重大改革。

第三、王安石強調「經學正所以經世務」，重申的是孔子建立的儒家傳統，但卻是在魏晉隋唐以來學風的極大改變，復活了兩漢注重「經世致用」的學風。經學在魏晉隋唐時代只是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早已失去實用的效果，王安石新學重新建立經學致用的觀念，並且具體落實經學的用途，在當時而言，也有復興經學的宣示意義在。

第四、「一道德以同風俗」是新學所揭示的最高理想，但並非王安石首倡，其構想來自《禮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其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孔穎達《正義》云：「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這種觀念其實宋儒都接受，司馬光即曾說：「王安石不當以一家之私學欲掩蓋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城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

之言，轉而陷於奇僻，流而入於異端。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52，〈起請科場劄子〉）反對王學者所反對的是將王安石的學術定為官學，在學校學習、科舉必考的狀況下定於一尊，這將使得其他學術在不公平的條件下失去競爭力，對學術的發展並不有利。這由道學在南宋取得優勢，元代《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後，《四書》的研究定於一說，導致經學僵化，徒具形式，失去生命力，可以得到明證。這是王安石等人事先所未曾考慮到的負面影響。

總而言之，王安石新學與三蘇蜀學是近代以來宋代學術研究上不被重視的一環，缺少了這個環節，宋代學術史的研究終究不是完整的呈現。可喜的是，民國六十年代以來，在宋史研究學者的努力下，台灣地區的宋史研究風氣大盛，從事宋史研究的學者人數大量增加，有關宋史研究的文獻資料陸續影印出版，為宋代學術研究工作提供了異常豐盛的資源。雖然不見有關王安石新學的研究專著，但大量以王安石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出現，無疑也對王氏新學的研究提供了極佳的研究背景。大陸地區方面，在改革開放的浪潮掀起之後，學術的研究也重新受到重視，近二十年來，大陸地區研究宋史的風氣在鄧廣銘等老一輩學者的倡導與鼓勵下，有飛躍式的進步，王安石的研究又再成為研究討論的重點對象。尤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除了文學與新法之外，王安石學術思想的研究也隨著研究廣度的擴展而大幅度的成長，發表了不計其數的專書與論文，其成長幅度猶在台灣學界之上。近幾年來，王安石新學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若能持續下去，「王安石新學」研究的豐碩成果，將極可能逐漸改變宋學的既有陳舊面目，這是可以期待的。

（六）參考文獻

（1）、現存王安石本人及其後學的著作

-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
-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 王安石：《詩義鈞沈》，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程元敏：《三經新義輯考彙評》，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1987年
- 容肇祖：《王安石老子註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張宗祥：《王安石〈字說〉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嚴一萍：《老子崇寧五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年。
- 王雱：《老子注》（按：《老子注》見《老子崇寧五注》）
- 王雱：《南華真經新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蔡卞：《毛詩名物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陸佃：《埤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 陸佃：《鷓冠子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年。

陸佃：《陶山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陳祥道：《論語全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陳祥道：《禮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耿南仲《周易新講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鄭宗顏：《考工記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王昭禹：《周禮詳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唐耜、

林之奇：《尚書全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林之奇：《拙齋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

(2)、宋代研究相關資料

脫脫：《宋史》，台北：鼎文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8年。

王偁：《東都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刊本，1979年。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世界書局，影印清刊本，1974年。

楊仲良：《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八年廣雅書局刊本，1967年。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抄本，1976年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廣雅書局刊本，1980年。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本，2000年。

李心傳：《道命錄》，台北：世界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本，1962年；又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1966年。

宋佚名：《靖康要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緒壬辰《十萬卷樓叢書三編》本，1967年。

宋佚名：《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宛委別藏影宋鈔本，1967年。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道光辛卯武原馬氏漢唐齋藏抄本，未署出版年月。

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刊本，1967年。

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刊本，1967年。

趙汝愚：《諸臣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刊本，1970年。

-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1981年。
-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叢書四百種》本，1968年。
-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
- 劉摯：《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二版。
- 楊時：《龜山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
- 朱熹：《朱文公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1980年。
- 朱熹：《朱子語類》，台北：文津出版社，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
- 呂祖謙：《東萊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
- 胡寅：《斐然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
- 陸游：《老學庵筆記》，木鐸出版社，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
- 吳曾：《能改齋漫錄》，木鐸出版社，影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
- 王應麟撰、翁元圻注：《翁注困學紀聞》，台北：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70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近人相關論著（含中、英、日文）

- 余英時：《朱子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年。
-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關長龍：《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年。
- 盧國龍：《宋儒微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
- 劉傳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 馬振鐸：《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武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蕭永明：《北宋新學與理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 李祥俊：《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李之鑒：《王安石哲學思想初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

(4) 期刊及論文集論文

- 羅家祥：〈北宋新學的歷史命運及其內在原因〉，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集》（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92-318。

- 羅家祥：〈北宋新學的興衰及其理論價值〉，《宋遼金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2001年第3期，頁2-7。原載《河北學刊》（石家莊），2001年第2期，頁4-9。
- 王書華：〈荊公新學的創立與發展〉，《宋遼金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2001年第3期，頁8-12。原載《社會科學論壇》（石家莊），2001年第4期，頁45-49。
- 鄧廣銘：〈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86。
- 楊渭生：〈王安石新學簡論〉，鄧廣銘、漆俠主編：《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45-362。
- 蕭永明：〈北宋新學與理學的會通與再創造精神〉，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11-327。
- 蕭永明：〈論荊公新學的治學特點〉，《中州學刊》，2001年3月第2期（總第122期），頁152-157。
- 范立舟、徐志剛：〈論荊公新學的思想特質、歷史地位及其與理學之關係〉，《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5月第40卷第3期，頁86-91。
- 劉成國：〈關於王安石的師承與後裔〉，《宋遼金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2003年第4期，頁34-37。原載《河北學刊》（石家莊），2003年第4期，頁169-172。
- 楊倩描：〈《易》學對王安石變法思想的理論支撐〉，《宋遼金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2004年第4期，頁41-46。原載《河北學刊》（石家莊），2004年第4期，頁159-164。
- 徐規、楊天保：〈走出“荊公新學”——對王安石學術演變形態的再勾勒〉，《宋遼金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2005年第2期，頁28-34，69。原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杭州），2005年第1期，頁31-39。